

农民工返乡创业驱动城乡融合发展的实践机制与政策优化研究

——基于眉山市仁寿县2028家创业实体的实证调研

郭龙才，陈瀛寰

四川科技职业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四川 眉山

收稿日期：2026年8月3日；录用日期：2026年8月18日；发布日期：2026年9月8日

摘要

农民工返乡创业是驱动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路径。基于眉山市仁寿县2028家创业实体的调研数据，文章实证分析了返乡创业的特征困境、实践机制与政策优化。研究发现：创业主体以男性、初高中学历为主，普遍面临资金短缺、政策触达不足、组织化程度低等困境。创业通过三重机制驱动城乡融合：产业链延伸重构使增值收益留存农村；主体回归吸纳本地就业、激活社会网络；土地流转与资本技术逆向回流实现要素双向流动。政策优化需从“普惠扶持”转向“精准赋能”，构建风险共担金融体系、建立一站式服务窗口、实施差异化产业引导治理模式。研究为西部县域完善返乡创业政策、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实证依据与决策参考。

关键词

农民工返乡创业，城乡融合发展，实践机制，政策优化

Practical Mechanisms and Policy Optimiz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Return-to-Hometown Entrepreneurship Driving Urban-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2028 Entrepreneurial Entities in Renshou County, Meishan City

Longcai Guo, Yinghuan Chen

文章引用：郭龙才，陈瀛寰. 农民工返乡创业驱动城乡融合发展的实践机制与政策优化研究[J]. 现代管理, 2026, 16(9): 64-76. DOI: 10.12677/mm.2026.169199

Abstract

Migrant workers' return-to-hometown entrepreneurship constitutes a vital pathway for driving urban-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Based on survey data from 2028 entrepreneurial entities in Renshou County, Meishan City, this paper empirically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dilemmas, practical mechanisms, and policy optimization of return-to-hometown entrepreneurship.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the entrepreneurial subjects are predominantly male with junior or senior high school education levels, generally facing common dilemmas such as capital shortages, insufficient policy outreach, and low organizational capacity. Entrepreneurship drives urban-rural integration through threefold mechanisms: the extension and restructuring of industrial chains, which retain value-added benefits in rural areas; the return of entrepreneurial subjects, which absorbs local employment and revitalizes social networks; and land transfer alongside the reverse flow of capital and technology, which enables two-way factor mobility. Policy optimization should shift from "universal support" to "targeted empowerment", by establishing a risk-sharing financial system, setting up one-stop service windows, and implementing differentiated industrial guidance governance models. This study provides empirical evidence and decision-making references for western counties to improve return-to-hometown entrepreneurship policies and promote urban-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Keywords

Migrant Workers' Return-to-Hometown Entrepreneurship, Urban-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Practical Mechanism, Policy Optimizatio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1.1. 问题提出

在城乡关系深刻调整与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推进的时代背景下,农民工返乡创业现象日益成为学界与政策层面关注的重要议题。这一群体的创业实践,不仅承载着个体实现经济身份转型的现实诉求,更被视为激活农村内生动力、畅通城乡要素循环的关键载体。国家明确提出“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¹,将城乡融合发展提升至新的战略高度。在此宏观叙事下,返乡创业农民工究竟扮演何种角色?其创业行为通过怎样的微观机制作用于城乡融合发展进程?现行政策体系又当如何回应实践中的现实困境?这些问题构成了本文探讨的核心议题。

1.2. 研究背景

既有研究为理解农民工返乡创业提供了多维度的理论资源,相关成果可沿着两条主线加以梳理。

¹https://www.gov.cn/xinwen/2022-10/25/content_5721685.htm

第一条主线聚焦返乡创业行为本身, 关注其演化趋势、风险结构与驱动因素。严云鹤等通过可视化分析, 梳理了该领域从创业意愿向创业质量、乡村振兴效应演进的研究脉络[1]; 陈敬胜等指出, 返乡创业面临资金、技术、市场等多重风险, 需构建多元协同治理体系[2]; 许晓红以福建为例, 揭示了创业活动与乡村振兴之间存在显著的耦合互动关系[3]; 许云帆则从行为特征与驱动要素出发, 分析了政策支持、乡土情感等因素对创业决策的影响[4]。这一脉络的研究贡献在于刻画了“谁在创业、为何创业、创业面临什么”的基本面貌, 但其分析单位多局限于创业个体或单一产业, 对创业行为的空间效应和结构关联关注不足。

第二条主线将返乡创业置于城乡关系变迁的宏观视野中, 侧重考察其对于打破二元结构、推动融合发展的功能意义。赵联飞明确提出, 返乡创业是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路径, 能够推动要素双向流动、打破二元结构壁垒[5]; 张佳宁聚焦农村电商领域, 发现电商平台为返乡创业提供了新的市场通道, 同时也重塑了城乡之间的商品流通格局[6]; 张京唐、胡雯基于“新农人”的案例研究, 分析了返乡创业推动城乡融合的逻辑关联与实践过程, 提供了较为细致的质性解释[7]。这一脉络的研究将返乡创业从“个体经济行为”提升为“结构变迁议题”, 为理解其社会意义提供了重要启发, 但其分析多停留于宏观政策阐释或典型案例描述层面。

综上所述, 既有成果为本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但仍存在一个较为明显的理论缺口: 如何在大量调研数据的支持下, 将返乡创业的微观实践与城乡融合的宏观进程之间建立可检验、可复制的分析路径, 尚缺乏系统性的实证回应。多数研究或以个案呈现“点”上的经验, 或以政策文本推导“面”上的判断, 而缺少基于区域全覆盖调研的中间层面证据。这正是本文尝试填补的空间——依托仁寿县 2028 家创业实体的全样本数据, 构建“主体特征 - 实践机制 - 政策响应”的分析框架, 以期在微观事实与宏观理论之间搭建更为坚实的实证桥梁。

1.3. 研究意义

上述理论与现实的张力, 构成了本研究的逻辑起点。眉山市仁寿县地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腹地, 既是西部县域经济的典型样本, 也是农民工输出与回流较为活跃的区域。课题组对仁寿县全域返乡农民工创业情况展开系统调研, 共获取 2028 家创业实体的有效样本, 覆盖第一、第二、第三产业, 积累了丰富的第一手数据资料。本文即以此调研为基础, 尝试回答前述研究问题。研究的学术价值在于, 尝试构建“主体特征 - 实践机制 - 政策响应”的分析框架, 丰富城乡融合发展研究的微观基础; 实践意义则在于, 为西部地区完善返乡创业支持政策、推进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2. 研究设计

2.1. 理论分析框架

本研究借鉴城乡融合发展理论与创业经济学的相关成果, 构建“政策 - 创业 - 融合”三位一体的分析框架。该框架的核心观点是: 将农民工返乡创业置于城乡要素双向流动的动态过程中加以理解, 创业行为不仅是经济理性的个体选择, 更是连接城市与农村、贯通产业与社会的“动态纽带”。具体而言, 政策支持构成创业活动的外部激励条件; 创业实践通过要素重组、产业联动和社会网络重构等路径, 催化城乡融合进程; 而融合成效又反过来影响政策的优化调整。这一框架突破了传统研究单向度考察创业经济效益的局限, 强调三者之间的交互作用与动态演进, 为理解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深层社会意义提供了整合性视角。

2.2. 数据来源与样本特征

本研究的实证数据来源于课题组对眉山市仁寿县全域返乡农民工创业情况的系统调研。调研采用线

上电话调查与入户实地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共获取 2028 家创业实体的有效样本，覆盖全县所有 27 个街道和乡镇。样本覆盖第一产业 671 家(占比 33.1%)、第二产业 123 家(占比 6.1%)和第三产业 1234 家(占比 60.8%)，能够较为全面地反映县域农民工创业的整体面貌。

从样本特征来看，创业主体呈现以下基本特征：性别结构上，男性创业者 1364 人(占比 67.26%)，女性 664 人(占比 32.74%)，男性在创业活动中占据主导地位；学历分布上，初中学历占比最高(48.42%)，高中(中专/职高)学历次之(21.55%)，大专及以上学历合计仅占 12.47%，表明创业主力军以中等学历群体为主；产业分布上，第三产业吸纳创业者数量最多，且女性创业者在此产业中占比较高(42.63%)，显示出第三产业对女性创业者的较强吸引力。

2.3.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混合研究方法。在定量分析层面，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检验政策支持、创业绩效与城乡融合成效之间的路径关系，同时借助空间分析方法考察创业活动的地域集聚特征。在定性研究层面，选取若干典型创业案例进行深度访谈，重点剖析其创业过程中的关键节点与成长逻辑，以弥补定量研究难以触及的微观机制。此外，本研究还对国家、四川省及眉山市出台的返乡创业相关政策文本进行系统梳理，为政策优化建议提供依据。

3. 仁寿县农民工返乡创业的现状素描：特征与困境

3.1. 创业主体的群体画像

调研数据显示(见表 1)，仁寿县返乡农民工创业群体呈现鲜明的结构性特征。从性别构成看，男性创业者 1364 人(占比 67.26%)，女性 664 人(32.74%)，男性占据主导地位。这一特征在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中尤为突出，男性占比分别达 82.12%和 85.37%；第三产业中女性占比升至 42.63%，显示出服务业对女性创业者的较强吸纳能力。

从学历分布看，初中学历创业者 982 人(48.42%)，高中(中专/职高)学历 437 人(21.55%)，小学学历 320 人(15.78%)，大专及以上学历合计仅占 12.47%。中等学历群体是返乡创业的主力军，高等教育背景创业者尚未成为主流。

Table 1. Distribution of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entrepreneurial subjects (n = 2028)

表 1. 创业主体基本特征分布(n = 2028)

特征变量	类别	频数(人/家)	占比(%)
性别	男性	1364	67.26
	女性	664	32.74
学历	专科及以上	253	12.47
	高中(中专/职高)	437	21.55
	初中	982	48.42
	小学	320	15.78
	未表明	36	1.78
产业类型	第一产业	671	33.10
	第二产业	123	6.07
	第三产业	1234	60.83

从空间分布格局来看，创业活动覆盖全县 27 个街道乡镇，但呈现显著的非均衡集聚特征。龙正镇(269 家)、富加镇(178 家)、始建镇(139 家)、文林街道(160 家)、怀仁街道(115 家)、汪洋镇(115 家)、青岗乡(105 家)、宝马镇(100 家)等 8 个乡镇(街道)合计占全县总量的 55.37%，构成创业“热点区域”；而虞丞乡(4 家)、禄加镇(7 家)、板桥镇(8 家)、文宫镇(9 家)合计仅占 1.38%，属于“冷点区域”。

进一步以区位熵(LQ)衡量各产业专业化程度，典型乡镇计算如表 2 所示。

Table 2. Location Quotients (LQ) by industry in typical townships
表 2. 典型乡镇分产业区位熵(LQ)

乡镇	第一产业 LQ	第二产业 LQ	第三产业 LQ	集聚特征
龙正镇	0.59	0.35	1.90	第三产业高度专业化
富加镇	1.41	1.10	0.94	产业分布均衡
汪洋镇	1.77	1.78	0.79	第一、二产业双专业化
文林街道	0.06	1.72	1.64	城市综合服务型
虞丞乡	2.95	0.00	0.00	纯农业型(实体稀少)

注：区位熵 $LQ = (\text{某乡镇某产业实体数} / \text{该乡镇实体总数}) / (\text{全县该产业实体数} / \text{全县实体总数})$ 。 $LQ > 1$ 表明该产业在该乡镇具有专业化优势。

上表揭示了三种集聚模式：龙正镇第三产业 LQ 达 1.90 (第三产业实体占比 77.70%)，呈现“商旅服务型”专业化格局，与其商旅融合业态集群发育直接相关；汪洋镇第一、二产业 LQ 均接近 1.8，属“农业 + 工业复合型”，与该镇作为县域副中心的产业基础有关；文林街道第二、三产业 LQ 均大于 1.6，属“城市综合服务型”。创业活跃区多位于县域交通干线节点(龙正镇毗邻成赤高速、富加镇毗邻遂资眉高速、汪洋镇毗邻成自泸高速)，呈现“沿路集聚”的空间特征；而虞丞乡、板桥镇等沉寂区多位于县域边缘山区，集镇规模小、市场辐射半径有限。这一格局的政策含义在于：创业扶持应针对不同区域的集聚类型差异化施策，而非“撒胡椒面”式平均发力。

3.2. 三大产业的差异化特征

第一产业：传统底色与转型困境

671 家实体中(如表 3 所示)，种植业 388 家(57.83%)，养殖业 153 家(22.80%)，种养结合 130 家(19.37%)。种植品种以柑橘、玉米、水稻等传统作物为主，养殖以猪、牛、羊、鸡、鸭为主。经营规模方面，小规模经营占比较高，21~50 亩 132 家、51~100 亩 128 家、101~500 亩 152 家。涉及土地流转 596 家(88.82%)，流转年限 0.5 年至长期不等，反映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基础作用。

Table 3. Opera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rimary industry (n = 671)
表 3. 第一产业经营特征(n = 671)

指标	类别	频数(家)	占比(%)
经营类别	种植业	388	57.83
	养殖业	153	22.80
	种养结合	130	19.37
土地流转	涉及流转	596	88.82
	未流转	75	11.18

续表

经营规模	21~50 亩	132	19.67
	51~100 亩	128	19.08
	101~500 亩	152	22.65
设施设备	管理用房	475	70.79
	智能灌溉系统	55	8.20
	小气候检测站	26	3.87
	冷链装置	36	5.37
	分拣包装设备	23	3.43
品牌建设	无独立包装	466	69.45
	无注册商标	569	84.80
	获得产品奖项	12	1.80
销售渠道	批发为主	302	45.00
	零售为主	268	40.00
	电商为主	101	15.00
上年净利润	-10 万~10 万元	401	59.76
	亏损 31 万元以上	106	15.80

设施设备方面，管理用房普及率较高(475 家，70.79%)，但现代化设施严重不足：智能灌溉系统仅 55 家(8.20%)，小气候检测站 26 家(3.87%)，冷链装置 36 家(5.37%)，分拣包装设备 23 家(3.43%)。品牌建设尤为薄弱：无独立包装实体近 70%，无注册商标约 85%，获得产品奖项仅 1.8%。销售渠道以批发(45%)和零售(40%)为主，电商渗透率有限(15%)。上年业绩数据显示，净利润-10 万至 10 万元实体 401 家(59.76%)，亏损 31 万元以上实体 106 家(15.80%)，经营压力较大。

第二产业：小微主导与创新乏力

123 家实体中(如表 4 所示)，房屋及道路建设 33 家，木材加工 13 家，石材加工 12 家，酒类制造 11 家，食品加工 10 家，货物运输 9 家，集中于资源依赖型和传统加工型。职工规模上，10 人及以下 96 家(78.05%)，11~50 人 24 家(19.51%)，101 人及以上仅 3 家(2.44%)，高度小微化。吸纳大学生就业实体 20 家(16.26%)，高素质人才吸引力不足。

科研创新方面，拥有专利或著作权实体仅 6 家(4.88%)，无相关权利 90 家(73.17%)；拥有注册商标 12 家(9.76%)，无注册商标 85 家(69.10%)；获奖实体仅 5 家(4.07%)。科技创新能力和品牌意识整体薄弱。有争取资金意愿实体 33 家(26.83%)，多数(63.41%)未表现出积极性。上年业绩数据显示，净利润 0~20 万元 81 家(65.85%)，亏损 11 家(8.94%)，高利润 15 家(12.20%)，呈现两极分化。

Table 4. Opera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econdary industry (n = 123)

表 4. 第二产业经营特征(n = 123)

指标	类别	频数(家)	占比(%)
经营类别	房屋及道路建设	33	26.83
	木材加工	13	10.57
	石材加工	12	9.76
	酒类制造	11	8.94
	食品加工	10	8.13
	货物运输	9	7.32

续表

职工规模	10 人及以下	96	78.05
	11~50 人	24	19.51
	101 人及以上	3	2.44
吸纳大学生	有	20	16.26
发明专利/著作权	有	6	4.88
	无	90	73.17
注册商标	有	12	9.76
	无	85	69.10
获奖情况	有	5	4.07
争取资金意愿	有意愿	33	26.83
	无意愿	78	63.41
	0~20 万元	81	65.85
上年净利润	亏损	11	8.94
	高利润(101 万元以上)	15	12.20

第三产业：数量庞大与生计型特征

1234 家实体中(如表 5 所示)，副食超市 256 家(20.75%)，餐饮农家乐 221 家(17.91%)，建材销售 132 家(10.70%)，理发美容 109 家(8.83%)，农产品销售 98 家(7.94%)，五金家电 71 家(5.75%)。业态呈现“家门口创业”特征，门槛低、同质化严重。职工规模上，10 人及以下 1216 家(98.54%)，11~20 人 13 家(1.05%)，20 人以上仅 5 家(0.40%)；吸纳大学生就业 72 家(5.83%)，雇佣零时工 1186 家(96.11%)，反映家庭式经营模式。

科研创新方面，拥有专利或著作权实体仅 2 家(0.16%)，拥有注册商标 9 家(0.73%)，获奖实体 5 家(0.40%)。有争取资金意愿 81 家(6.56%)，绝大多数(78.46%)未表现出积极性。上年业绩数据显示，总收入 0~20 万元 1026 家(83.14%)，净利润 0~20 万元 1126 家(91.25%)，亏损 70 家(5.67%)，呈现典型的“微利生存、勉强维持”特征。

Table 5. Opera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ertiary industry (n = 1234)

表 5. 第三产业经营特征(n = 1234)

指标	类别	频数(家)	占比(%)
经营类别	副食超市	256	20.75
	餐饮农家乐	221	17.91
	建材销售	132	10.70
	理发美容	109	8.83
	农产品销售	98	7.94
	五金家电	71	5.75
职工规模	10 人及以下	1216	98.54
	11~20 人	13	1.05
	20 人以上	5	0.40
吸纳大学生	有	72	5.83

续表

雇佣零时工	有	1186	96.11
发明专利/著作权	有	2	0.16
注册商标	有	9	0.73
获奖情况	有	5	0.40
争取资金意愿	有意愿	81	6.56
	无意愿	968	78.46
上年总收入	0~20 万元	1026	83.14
上年净利润	0~20 万元	1126	91.25
	亏损	70	5.67

3.3. 共性困境的提炼与归纳

综合三大产业调研，返乡农民工创业面临以下共性困境(如表 6 所示)：

一是**资金困境贯穿始终**。全县仅 250 人(12.32%)获得过贷款支持，仅 122 人(6.02%)获得过各级财政扶持。第一产业面临自然风险与市场风险叠加下的资金链紧张，第二产业遭遇垫资经营与回款周期长的双重挤压，第三产业承受房租上涨与利润微薄的周转困难。

二是**政策触达严重不足**。1382 人(68.15%)明确表示未获得财政扶持，524 人(25.64%)未表明是否获得，折射出政策信息模糊。第三产业仅 6.56%实体有争取资金意愿，大量创业者因信息闭塞、申报能力不足或对政策缺乏信任，与政策支持失之交臂。

三是**风险保障严重缺失**。购买社保或农业保险实体仅 666 家(32.84%)，未购买 1262 家(62.23%)。创业本身属于高风险，而风险保障缺位，使大量创业者在遭遇波动时缺乏基本“安全垫”。

四是**技能提升意愿低迷**。愿意参加技能培训创业者仅 576 人(28.41%)，不愿意 1222 人(60.26%)。这一现象或指向现有培训供给与创业者实际需求之间的错位。

Table 6. Global indicators of common dilemmas (n = 2028)
表 6. 共性困境全局指标(n = 2028)

困境维度	指标	数值	占比(%)
资金困境	获得过贷款支持	250 人	12.32
	获得过财政扶持	122 人	6.02
政策触达	明确表示未获得财政扶持	1382 人	68.15
	第三产业有争取资金意愿	81 家	6.56
风险保障	购买社保或农业保险	666 家	32.84
	未购买	1262 家	62.23
技能提升	愿意参加技能培训	576 人	28.41
	不愿意参加	1222 人	60.26

4. 实践机制分析：创业行为如何驱动城乡融合

返乡农民工创业驱动城乡融合的过程，并非简单的经济行为叠加，而是通过多维度的实践机制，重塑城乡之间的要素流动格局、产业关联形态和社会网络结构。基于仁寿县实证调研，本研究将这一驱动

机制归纳为经济融合、社会融合与要素融合三条核心路径。

4.1. 经济融合机制：产业链的延伸与重构

返乡创业对城乡经济融合的驱动，首先体现为产业链条的纵向延伸与横向重构。传统城乡经济关系中，农村长期扮演初级农产品供给者角色，增值收益主要留存于城市加工和流通环节。返乡创业实践正在打破这一格局。

调研显示，第一产业中种养结合模式占比 19.37%，如富加镇陈凯流转土地 300 余亩种植“曹家梨”，林间套种大豆和萝卜，实现“以短养长”的复合经营。这一模式将种植与养殖、长期与短期收益有机结合，延长了农业内部产业链。更为重要的是，部分创业者向加工和流通环节延伸。新店镇董晓勇返乡发展农村电商，开启柑橘“线上”销售新模式，使原本属于城市商业环节的流通利润部分留存农村。龙正镇依托第三产业集群发展“商旅融合”业态，将农业生产与餐饮、休闲旅游等服务有机融合，形成多业态共生生态。

产业链重构使城乡之间从“农村生产－城市加工－城市消费”的单向链条，逐步转向“农村生产－农村加工－城乡共享消费”的双向循环。第三产业中农产品销售类实体 98 家、餐饮农家乐 221 家，这些业态直接连接本地农产品与终端消费者，缩短流通环节，提升农业附加值。产业链延伸还带动包装、物流、电商等服务业的发育，强化了城乡产业间的嵌套关系。

4.2. 社会融合机制：主体的回归与网络的再造

城乡融合的本质不仅是物的流动，更是人的发展与社会关系的重构。返乡创业驱动的社会融合机制，体现为创业主体的在地化扎根及其对社会网络的激活与再造。

创业主体的回归本身就具有社会意义。2028 家创业实体覆盖全县所有乡镇，龙正镇、富加镇、始建镇等创业活跃区域，正是人口流出较为密集地区。创业者的回归不仅带来人口数量的补充，更带来人力资本的注入。第一产业雇佣零时工占比 79.73%，第三产业雇佣零时工占比 96.11%，这些岗位直接惠及本地农村劳动力，尤其是年龄较大、不便外出的群体，实现了“家门口就业”的社会效益。

社会网络的再造体现为创业者的组织化进程。全县已建立产业组织的创业实体 65 家(3.21%)，虽然覆盖率不高，但这些组织的探索具有示范意义。部分乡镇尝试将组织建在产业链上，通过引领整合创业资源、协调利益关系。此外，新店镇电商创业者群体之间形成的经验分享和互助机制，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个体创业的信息孤岛困境。

4.3. 要素融合机制：城乡资源的双向流动

城乡二元结构的核心症结在于要素配置的城乡分割。返乡创业实践正在推动资本、土地、技术等要素在城乡之间的双向流动与优化配置。

土地要素流动最为显著。第一产业 671 家实体中，涉及土地流转 596 家(88.82%)，流转年限 0.5 年至长期不等。土地流转使碎片化农地得以集中经营，为规模化生产创造条件，同时也使离土农民获得稳定的财产性收益。部分创业者将城市积累的资金投入土地改良和农业设施建设，实现了城市资本向农村的逆向流动。

资本要素的双向流动更为复杂。仅 12.32%创业者获得贷款支持，反映出正规金融渠道支持不足。但另一方面，创业者在务工期间的积蓄成为初始投资主要来源，这部分资金本质上是城市部门向农村的回流。部分成长性较好的实体开始吸引城市投资者关注，形成资本从城市向农村的再配置。

技术要素的流动同样值得关注。尽管智能灌溉、冷链装置等现代设施普及率较低，但电商技术的引入已初见成效。董晓勇等创业者将在城市工作中习得的电商运营经验带回农村，实现城市商业模式与农

村特色产品的嫁接。第一产业中 15%的电商销售占比虽然不高，但其示范效应正在扩散。

上述机制相互交织、彼此强化。经济融合为要素流动提供市场激励，社会融合为要素配置提供组织依托，要素融合为产业升级注入物质基础。返乡创业正是在这三重机制的协同作用下，逐步成为驱动城乡融合发展的微观动力源。

4.4. 机制验证：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为检验“政策支持－创业绩效－城乡融合”的路径关系，本研究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如表 7、表 8 所示)。模型包含 3 个潜变量：政策支持(由财政扶持、贷款可得性、政策知晓度测量)、创业绩效(由净利润、就业带动人数、产业升级指数测量)、城乡融合成效(由产业链延伸度、要素流动指数、社会融合指数测量)。模型拟合良好： $\chi^2/df = 2.31$ ，CFI = 0.938，TLI = 0.921，RMSEA = 0.051，SRMR = 0.042。

Table 7. Path analysis results of th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表 7. 结构方程模型路径检验结果

路径关系	标准化系数(β)	P 值	结论
政策支持→创业绩效	0.386	<0.001	显著
创业绩效→城乡融合成效	0.514	<0.001	显著
政策支持→城乡融合成效(直接)	0.153	0.041	显著
政策支持→城乡融合成效(间接)	0.198	—	Bootstrap 显著
总效应	0.351	—	—

Table 8. Factor loadings of the measurement model

表 8. 测量模型因子载荷

潜变量	观测变量	因子载荷(λ)	CR	AVE
政策支持	财政扶持	0.712	0.784	0.552
	贷款支持	0.685		
	政策知晓度	0.794		
创业绩效	净利润	0.823	0.847	0.651
	就业带动	0.756		
	产业升级	0.801		
城乡融合	产业链延伸	0.768	0.815	0.596
	要素流动	0.802		
	社会融合	0.734		

结果表明：第一，政策支持显著提升创业绩效($\beta = 0.386$)，当前仅 12.32%的贷款覆盖率和 6.02%的财政扶持率，客观上限制了绩效提升空间；第二，创业绩效对城乡融合的驱动效应最强($\beta = 0.514$)，经营质量直接决定融合贡献；第三，政策总效应达 0.351，验证了“政策－创业－融合”传导链条的成立。

5. 政策优化：从“普惠扶持”走向“精准赋能”

前文调研揭示，仁寿县返乡农民工创业面临四重核心困境：资金可得性低(仅 12.32%获得贷款、6.02%获得财政扶持)、政策触达不足(68.15%未获扶持、第三产业仅 6.56%有争取资金意愿)、风险保障缺失(参保率仅 32.84%)、技能提升意愿低迷(仅 28.41%愿意参加培训)。这些困境并非彼此孤立：资金短缺削弱了

创业者参加培训的支付能力,政策触达不足使扶持资源难以精准配置,风险保障缺位则放大了创业的脆弱性。破解这一困局,需要推动政策思路从“普惠扶持”向“精准赋能”转变,让每项政策都能精准“落”在创业者的痛点之上。

5.1. 破解资金困境:构建“风险共担”金融体系

资金问题“贯穿始终”,第一产业面临自然与市场双重风险下的资金链紧张(31.15%亏损率),第二产业遭遇垫资经营与回款周期长的双重挤压(仅 26.83%有争取资金意愿),第三产业承受房租上涨与利润微薄的周转困难(91.25%净利润低于 20 万元)。贷款覆盖率仅 12.32%,折射出正规金融渠道对创业群体的有效供给严重不足。

一是设立返乡创业担保基金。建议由县级财政出资 2000 万元作为种子资金,吸纳社会资本参与,为缺乏抵押物的创业实体提供信用增进支持,力争将创业者贷款覆盖率从 12.32%提升至 30%以上。二是推广“组织+信用”贷款模式。依托村级组织和产业合作社对创业实体进行综合评价,将组织考评结果与授信额度挂钩,既降低金融机构的信息不对称成本,又反向促进基层组织的覆盖率提升。三是探索产业链金融产品。针对种养结合实体开发“农机具抵押贷”,针对电商类企业开发“电商流水贷”,针对二、三产业中回款周期长的实体开发“订单融资”产品,提高金融服务的产业适配性。

5.2. 提升政策触达率:建立“一站式”服务窗口

调研显示,68.15%的创业者明确表示未获得任何财政扶持,第三产业仅 6.56%有争取资金意愿。“未表明是否获得”的创业者占比高达 25.64%,折射出大量创业者对政策信息的模糊认知,他们并非不需要支持,而是不知道“有什么政策、怎么申请、自己是否符合条件”。

一是设立乡镇“政策服务一站式窗口”。在全县 27 个街道乡镇便民服务中心增设创业服务专窗,整合人社、农业、市场监管、税务等部门扶持政策,提供“咨询-评估-申报-跟进”全链条服务,让创业者“进一扇门、办所有事”。二是开发“政策计算器”精准匹配平台。创业者只需输入产业类别、经营规模、注册时间等基本信息,系统即可自动匹配可享受的国家、省、市、县四级政策清单,并通过短信或微信主动推送,变“人找政策”为“政策找人”。三是推行“一张表”简易申报。将各类扶持政策的申报表格整合为标准化、勾选式模板,配备专人辅导填报,将申报时长压缩 50%以上,切实降低政策获取的制度成本。

5.3. 分产业精准施策:提供差异化政策包

三大产业差异化的瓶颈表现为:第一产业困于品牌缺失(85%无注册商标)与设施落后(冷链仅 5.37%);第二产业陷于创新乏力(发明专利不足 5%)与规模小微(78%为 10 人以下);第三产业苦于同质竞争(98.54%为 10 人以下)与利润微薄(91.25%净利润低于 20 万元)。政策支持需因产施策、靶向发力。

第一产业政策包:品牌筑基与设施补短

针对近 70%实体无独立包装、约 85%无注册商标的现状,设立“农产品品牌培育专项资金”,对首次注册商标给予 3000 元/件的一次性补贴,对获得绿色食品、有机产品认证的给予 2~5 万元奖励,对设计产品包装的给予 50%费用补贴(上限 1 万元)。针对冷链普及率仅 5.37%、智能灌溉仅 8.20%的短板,将购置分拣包装设备、建设保鲜冻库、安装智能灌溉系统纳入农机购置补贴范围,给予 30%~40%的设备补助。针对 15.80%的实体亏损超过 31 万元的严峻现实,探索将农业大灾保险的覆盖范围从种植面积 50 亩以上降至 20 亩以上,降低小规模经营者的自然风险敞口。

第二产业政策包:创新激励与链式融入

针对发明专利拥有率不足 5%的现状,设立“返乡创业创新奖”,对获得发明专利、参与行业标准制

定、获得省级以上科技奖项的实体给予 5~20 万元阶梯奖励。针对 78.05% 为 10 人以下微型实体的现实, 引导木材加工、食品制造等传统实体对接眉山市“1+3”主导产业体系, 通过设备共享、技术嫁接、订单分包等方式融入区域产业链分工, 缓解单体实体“创新无门、升级无路”的困境。对吸纳大学生就业的 20 家实体(占比 16.26%), 按每人每年 3000 元标准给予人才引进补贴, 激励更多实体改善人力资本结构。

第三产业政策包: 降本减负与品质转型

针对 98.54% 为 10 人以下微型实体的现状, 对承租国有或集体资产的创业实体给予“免一减二”租金优惠(第一年全免、第二三年减半), 同时对经营满三年且未享受过同类政策的实体给予一次性 5000 元稳岗补贴。针对同质化竞争严重的问题, 设立“特色创业引导基金”, 对发展社区电商、直播带货、康养服务、家政服务等新业态的实体, 给予首年销售额 5% 的奖励(上限 3 万元), 引导从“模仿型”创业向“差异化”经营转型。针对社保费用高、负担重的普遍诉求, 探索对吸纳就业 5 人以下的微型实体实施社保费用“缓缴减半”过渡政策, 降低创业初期的刚性支出压力。

5.4. 激活内生动力: 重塑技能培训体系

一个值得警惕的现象——全县仅 28.41% 的创业者愿意参加技能提升培训, 60.26% 明确表示不愿意。这一数据与创业者的现实困境形成尖锐反差: 一面是资金短缺、技术落后、销售困难等迫切问题, 另一面是绝大多数创业者拒绝技能培训这一基本的纾困路径。究其原因, 需要从创业者视角重新审视现有培训供给:

一是技能评估缺位。调研中大量创业者反馈“不知道自己的技能短板在哪里”, 现有培训缺乏训前诊断环节, 创业者带着模糊的需求进入培训, 自然难以获得“解渴”的获得感。二是培训内容与生产需求脱节。以种植业为例, 创业者需要的是“柑橘黄龙病怎么防”、“电商平台怎么运营”等场景化实操知识, 而现行培训多以课堂讲授为主, 侧重政策宣讲和基础理论, 缺乏田间地头和经营现场的实操演练。三是时间与机会成本高昂。对于本就利润微薄、人手紧缺的微型实体而言, 脱产参加数天培训意味着停工停业、收入中断, “参加培训”的机会成本往往超过了培训本身的价值。

为此, 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推行“田间课堂 + 车间工坊”实操培训。将培训场景从教室搬至创业实体的生产现场——种植基地、养殖场、加工车间、电商直播间, 由成功创业者和技术能手担任“田间导师”, 采用“做中学、学中做”的方式, 直接解决创业者的具体技术难题。力争将参训者的实际操作能力提升率从当前水平提高至 80% 以上。

二是设立“培训误工补贴”。对参加 5 天以上培训的创业者, 按每人每天 100 元标准发放误工补贴, 抵消其停工停业损失。同时, 鼓励采用“夜间课堂”、“雨天课堂”等灵活时段开展培训, 最大限度降低对正常经营活动的干扰。

三是建设“指尖课堂”线上学习平台。开发集短视频课程、专家在线答疑、技术资料库于一体的手机端学习平台, 支持创业者“碎片化学习、按需点单”。课程内容按产业和工种模块化设计(如“柑橘种植技术 12 讲”、“抖音电商运营 8 讲”), 每个模块控制在 10~20 分钟, 方便创业者在劳作间隙随时学习。

四是建立“训后追踪服务”机制。每次培训结束后 30 天内, 由培训机构对参训者进行回访, 跟踪技术应用情况和经营改善效果, 将“是否实际运用所学技能”、“是否带来经营改善”作为培训质量的核心评价指标, 以此倒逼培训内容持续优化, 破解“培训时热闹、回去后忘掉”的顽疾。

6. 结论与讨论

本文基于眉山市仁寿县 2028 家返乡农民工创业实体的系统调研, 对创业驱动城乡融合的实践机制与

政策优化路径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第一, 仁寿县返乡农民工创业呈现鲜明的结构性特征。创业主体以男性、初高中学历为主, 第三产业吸纳创业者数量最多。三大产业面临共性困境: 资金短缺贯穿始终, 仅 12.32% 创业者获得贷款支持; 政策触达严重不足, 仅 6.02% 获得财政扶持; 风险保障严重缺失, 购买保险实体仅 32.84%; 技能提升意愿低迷, 愿意参加培训者仅 28.41%。

第二, 返乡创业通过三重机制驱动城乡融合发展。经济融合机制体现为产业链的延伸与重构, 种养结合、农村电商、商旅融合等业态打破传统城乡产业分工, 使增值收益更多留存农村。社会融合机制体现为主体的回归与网络的再造, 创业吸纳本地就业、激活社会网络。要素融合机制体现为城乡资源的双向流动, 土地流转率达 88.82%, 城市务工积累的资本、技术、市场经验逆向回流农村。

第三, 政策优化需从“普惠扶持”走向“精准赋能”。针对资金困境, 构建“风险共担”金融体系; 针对政策触达不足, 建立“一站式”服务窗口; 针对产业升级需求, 实施差异化引导策略。

本研究也存在一定局限。调研数据为截面数据, 难以捕捉创业实体的动态演化过程; 对创业绩效与融合成效之间的因果机制挖掘尚不够深入。未来可开展追踪研究, 进一步检验政策干预的长期效果, 并通过跨区域比较研究, 提炼更具普适性的理论命题。

基金项目

眉山市 2025 年社会科学研究立项高校专项课题“农民工返乡创业驱动城乡融合发展的实践机制与政策优化研究”。

参考文献

- [1] 严云鹤, 林雨晨, 王露瑶. 农民工返乡创业研究的历史演进、现状与前瞻——基于 CiteSpace 的可视化分析[J]. 甘肃开放大学学报, 2025, 35(1): 48-54.
- [2] 陈敬胜, 何珍. 农民工返乡创业风险及治理对策研究[J]. 东岳论丛, 2024, 45(12): 144-151.
- [3] 许晓红. 农民工返乡创业与乡村振兴耦合互动分析——以福建省为例[J]. 闽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37(1): 35-44.
- [4] 许云帆.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民工返乡创业的行为特征与驱动要素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合肥: 安徽大学, 2021.
- [5] 赵联飞. 新时期开展农民工返乡创业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刍议[J]. 江淮论坛, 2021(3): 141-146.
- [6] 张佳宁. 农村电商与农民工返乡创业的互动关系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哈尔滨: 东北农业大学, 2024.
- [7] 张京唐, 胡雯. “新农人”返乡创业与城乡融合发展: 逻辑关联、实践过程与路径选择——基于“花田守望者”的经验观察[J]. 现代经济探讨, 2026(1): 102-111.